

地方志和方志学

邹身城
林正秋

撰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丛书

地方志和方志学

邹身城 林正秋

学报编辑
杭州师范学院
浙江地方史研

序

地方志可以说是我国长期流传下来的特殊的史种。它是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不同的书籍，逐步演变而来的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它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录，既反映各该行政区域的天文、地理、气候、资源、灾害，又反映各族人民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过较大贡献。我们不但为祖国具有光荣历史而感到自豪，我们还有责任研究祖祖辈辈的历史，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过，要重视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研究历史和现状，需要充分掌握具体的史料。

历代的史料是多方面的，方志正是其中极有价值的一种。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化的发达、人事的繁复，在政治、经济、资源、文化、艺术等方面逐渐出现许多不同的专门史。方志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地方史。我国各地都有修方志的传统，它保存了各地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地方志的不断续修，使各地过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情景得以展现于今日。这个优良传统不应该让它中断。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这一承前启后、衔接历史的编修方志的工作，指出当前开展编修方志，是我们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

要修纂地方志，就会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探讨，因此地方志与方志学是当前应该研究探索的课题。

我校地方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将平时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为理论上的探讨，一部分为浙江方志的介绍，汇成一册，以求正于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同志们。希望使我国重视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在今天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李 立 心

1981年11月

于杭州师范学院

目 录

序

第一编.....邹身城

- 地方志和方志学..... 1
- 国情·方志·现代化..... 9
- 地方志盛衰规律初探.....15
- 方志性质辨.....24
- 论方志学的改制更新.....31
- 新方志的“百科全书化”.....41
- 方志学与家谱学.....46

第二编.....林正秋

- 浙江地方志举要.....53
- 浙江名山志叙录.....66
- 南宋行都三志.....77
- 南宋武林笔记四种摘评.....81

地方志和方志学

邹 身 城

地方志，亦称方志，是编纂地方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气象、科技等方面内容的资料性兼记述性的书籍。举凡地方沿革、政治建制、物产土俗、山川名胜、人物户口、风俗方言以及艺文等，无不分门别类辑入书。

方志的种类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具有全国性质的称“一统志”，涉及几个省的称“总志”，一省范围的称“通志”，府郡州县称“府志”、“郡志”、“州志”、“县志”，县以下还有乡、镇、里、邑各志。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追本溯源，一般说可以追叙到汉代。历朝对方志编纂，不断地有所发展，隋唐以后，统治者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视；至宋代许多府县已普遍修志。明清两代，志书益繁，朝廷明令各地修志，成为一项制度。明人张邦政说：“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道莫不有志。”清人邱文庄说：“世有千载不刊之书，无百年不葺之志。”说明地方修纂志书，蔚为盛事，形成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

我国的方志卷帙浩繁，至今传世的估计多达万种，约十余万卷。现我国地方志的收藏，以北京图书馆首屈一指，约有六千多部；上海图书馆位居第二，约有五千部；再次是南京图书馆，约有四千部；国内还有不少地方图书馆、大学图

书馆和台湾的图书馆，收藏也很丰富。流传在国外的，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墨西哥等国家，均有大批的我国方志，其中不乏珍本。据报导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即收藏有我国各种地方志达五千五百七十二种，不少善本摄制成缩微本，保存在装置空气调节机、空气过滤器等先进设备的洞库里，视为人类文化的珍品。

尽管旧时的地方志大多数是由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编修的，起着维护其政治统治的作用，所谓“县太爷下马看方志”，“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然而在客观上它们为各地方提供的有用资料是不可估量的，对于后人研究历史上各地方区域的各类课题，无不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代封建王朝都曾利用地方志编写“断代史”、地理书、一统志、类书等。如西晋以来的地理书、一统志，唐宋以来的类书、辞书，在编写过程中总是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引用尤多。我国悠久的文化之所以能不遭到中断，地方志在其中起到一部分作用。

地方志积累有综合性的科学内容。例如《湖州府志》、《乌青镇志》具体描述历来水田耕作的工具和技术；民国《新昌县志》附有农民调查，分蚕、桑、烟、茶、木、矿等篇；光绪《于潜县志》载有耕织图四十六幅；湖北的一些地方志反映湖北鱼类的名称、品种、繁殖、生长和活动地点特详，还记述渔民们因地制宜创制各种不同工具进行捕捞；《庐山续志稿》记载我国花卉植物种类之多，为世所罕有；湖北《竹溪县志》上记载有同治元年观测到极光的资料；广东广西一部分地方志对于气候的变化与地形的关系，作了正确的阐述；乾隆《黔滇志略》对于云贵著名岩洞一一作出精辟的叙

述，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厚石灰岩的分布；在人文科学方面，地方志对于各地社会史、经济史、阶级斗争史，以及各地人物、历史、风俗、语言、文学等的研究，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外文化交流关系的探讨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类资料都是前辈为我们积聚的可贵的文化遗产。

近年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地方志所提供的资料，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查阅大量方志记载，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以及《中国古今铜矿录》等书；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编辑的《中国天文气象总表》大量吸收地方志记载的材料；中央气象局编辑《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也是从大量地方志采择而成。我国历史上有连绵不绝的地震记载，从公元前十二世纪起至今三千多年中，史书和方志记载有破坏性地震共达八百八十余次之多，为了探寻地震的规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系根据八千余种文献整理而成，其中地方志占五千六百余种。广西省地震局也通过大量地方志，整理出公元222—1978年间地震记录325例，编成《广西地震志》，对于该地区地震趋势的研究和基本建设的规划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最近，我国天文学家徐振韬等，利用古代方志中有关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和变化，查出二十三条关于十七世纪的太阳黑子记录，其中六条是在“蒙德极小期”内（太阳活动的衰落期），从而为澄清国际天文学界由于资料不足而造成假象的论断，提出了新见解。英国《泰晤士报》于1981年2月4日刊载了徐振韬等的这项科研成果，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注意。多年来我国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的水文考古调查，除对河流两岸实地进行调查勘测外，同时查考了有

关地方志的记载，获得一定的成果。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查阅三百多种地方志，搜集了有关我国在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 历史资料，足以为外交斗争提供历史依据。1979年广东省新丰、恩平两县发生地界纠纷时，法院查阅两县县志，找得历史根据，作判案参考。

我国地方志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利用于科学研究工作。如日本的水产研究专家根据我国的《八闽通志》、《霞浦县志》和其他方志所记载的渔业资料，写出学术论文，供发展渔业生产参考。国际科技史的学术权威李约瑟在所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里，广泛参考、引证了我国地方志资料，因而对中国地方志的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对中外古文献作了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说，西方类似的地方文献极少，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种，《耶路撒冷城志》、《不大列颠志》等虽也可与中国的某些方志媲美，但它们的记载都缺乏连续性，不象中国方志不断得到补修。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也称赞中国地方志“是各地的学者长期以来辛勤工作而得出的硕果。”

中国地方志的特点之一，是长期保持连续。上述丰富资料的积累，主要依靠地方志的不断续修，才能保持它的连续性。唐代政府规定全国各州各府每三年或五年给尚书省兵部职方造送图经一次；明代永乐以后多次发布修志命令，附有“修志条例”；清代康熙要求各省、府、州、县勤修志书，对省志规定每六十年必须编修一次。各县县志人力较足的每二、三十年即行重修，现存清代常熟县志共编修十三次，平均每二十年修志一次。人力财力不足之区，修志次数相对减少，往往只就旧志原版的某一部分，略作修补。总起来看，连续重修三次以上的县志，为数极多。

由此可见，兴修地方志是继承祖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过去没有中断，今天更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中断。我们有责任对旧时代的方志加强研究，我们同时还有责任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重新修纂新型的方志。修好新方志，既可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提供出本地区各项可靠的资料，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又可以为后世子孙积累必要的资料。修志的重大意义，即在于此。

历来的学者在编修方志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不断研究修志的学问，这种学问终于逐渐脱离正史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便是所谓方志学。

方志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方志体制、源流、编纂方法等的研究，陆续出现一些论著。清初学者顾炎武首开其端，他在检读研究地方志的基础上，利用方志资料撰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大名著，开拓了方志学的研究领域。章学诚继起，对方志理论多所发明，他提出《方志立三书议》，主张“志属史体”，又在“六经皆史”的思想指导下，注重文献资料的积累。尤其重要的是他所著《修志十议》，更成为后世编纂方志的重要参考论著。与章学诚的理论相对立的有戴震的理论，戴震认为“志以考地理，但悉心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人们称戴震为修志的旧派代表，称章学诚为新派代表。不同论点的争鸣，有助于方志学的发展。后来，梁启超著《清代学者整理国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对清代方志学研究进行了总结。瞿宣颖写了《志例丛话》，王葆心写了《方志学发微》，黎锦熙写了《方志今议》，傅振写了《中国方志学通论》，这些著述，对方志学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朱士嘉著的《中国地方志浅说》，是一篇影响较大的专论，

对地方志的起源、发展、特征、价值及国内外馆藏等问题，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与剖析。傅振论著的《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对方志的起源进行了专门的论述。陆振岳著的《方志源流试探》对方志名目的演变、方志的流变和旧方志学的建立，作了深入的探讨。徐一贯著的《地方史与文史资料研究》，《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史以述往、志以示来》等文，对地方史志异体提出新的看法。来新夏著的《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综述了地方志历来的研究状况，探索了今后研究工作的趋势。关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制和编纂方法，目前正由各地学者在编纂实践中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是方志目录的编纂。方志目录创编于清代，粗具规模却在民国初年，有谭其骧所编《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任凤苞所编《天香园方志目》等，都是馆藏（家藏）目录。瞿宣颖所编《方志考稿（甲集）》，是一种提要性质的目录，著录了冀、鲁、豫、晋、苏及东北各省方志六百余种。1935年朱士嘉所创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五千八百三十二种，后又补编了七百三十种，开创编制全国性的地方文献目录的新局面。1956年朱士嘉增补订正了旧作，出版了增订本，增益八百五十一一种，合共七千四百十三种。为了更全面、更完备地反映方志的馆藏情况，在《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基础上又作了广泛的调查著录，新编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已达八千五百余种。王建宗、刘喜信合编《山东地方志书目》是一种新编区域性书目，著录旧志五百九十七种外，又著录新编志五十七种，并转载了山东古方志。张国淦著的《中国古方志考》是采取辑录体的一部提要目录，收录了秦汉至元的地方史志约四千余种，凡有名可稽，不论存佚，概加收录，略附考证。

三是古志的辑佚。古代史籍中散见的古志资料，以《永乐大典》收录的古志为最多。清代进入方志的全盛时期，古志的辑佚工作也兴盛起来，陆续涌现出一批专门收辑古方志的学者。其中著名的如王谟、马国翰、陈运溶等，从唐宋类书中辑录了许多古方志，分别收入《汉唐地理书抄》、《玉函山房辑佚书》和《麓山精舍丛书》中。孙诒让辑录了刘宋时的《永嘉郡记》刻成单行本。陈运溶还辑录南北朝湖广地区方志四十多种，每种篇幅有限，少则几条，多则二、三十条，仍能反映该地区的气候、地貌、土壤、水利、资源、土特产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概况，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有所记载，是极其珍贵的方志史资料。民国后，鲁迅收辑《会稽记》、《会稽典录》等多种；赵万里辑《析津志》。《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原存甘肃敦煌石窟，后被法国伯希和掠去，幸经罗振玉整理，收入《鸣沙石室佚书》和《敦煌石室遗书》。建国以后陆续发现一些方志的稿本和珍本，为防散佚，并给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刊印了一部分稀见的旧志。如刊印元李兰膺等撰、赵万里校辑的《元一统志》；明人《祝枝山手写正德兴宁志稿本》；影印明万历刊本《顺天府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已影印省志一种、府志三十三种、州志十八种、县志五十九种）。又广西博物馆刊印了十几部馆藏未刊的旧稿本；吉林省图书馆油印了稀见的吉林县地方志四十九种。另外，中国科学院曾往日本摄制流传日本的珍本方志胶卷。这类珍贵的民族遗产，不但需要挖掘、抢救、保藏，更需要及时加以整理、研究、刊印，使之有效地贡献于人类。

四是对地方志进行分区研究，是近年苗起的一项新门类。1935年庄为玘综合研究泉州五县的地方志，撰《泉州方志考》。1945年至1947年间，洪焕春撰《雍正浙江通志两浙志乘篇考

异》、《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考》、《宋元四明旧志及其版本》等文，1957年又出版《浙江地方志考录》，是为开展地方志的区域性研究的先声。1963年上海师院编《上海地方志资料考录》，是继洪焕春之后进一步发展区域性的考录工作。两三年来区域性研究方志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较有份量的如谯枢铭《上海地区方志述略》、王建宗等《山东省编修地方志情况简介》、里僻《略述方志源流和〈湖北通志〉沿革》、李德运《我省（陕西）著名地方志简况》、金恩晖《吉林省地方志考异》、高树榆《宁夏方志考》、纪大椿《新疆地方志浅说》、刘毅伟《民国年间山西修志概述》等，不下数十种，目前正向纵深处发展。

总之，在我国两千多年的方志发展史上，不仅编制有上万部的各类型方志，而且还开拓了方志学的研究领域，留传下来一份丰富的宝贵遗产。对于这份遗产，既要审慎地继承与吸收其合理部分，同时也应以批判态度去认真研究，给予恰当的利用和评论。

糟粕常与精华混杂在一起。旧方志多为封建官僚、封建文人所编修，渗透了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烙印。清人阮元就指出过地方修志的弊端：“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近人张树棻也引用章学诚的话说：“条理混杂，详细失体，偏尚文辞，妆点名胜；擅翻旧案，浮记功绩；泥古不变，贪载传奇。”旧志舛误，可见一斑。因此，我们在整理旧方志和研究方志学时，需要紧紧掌握住马列主义的批判武器，正确地辨析其精华与糟粕。

国情·方志·现代化

邹 身 城

近来常听到有人谈论“国情”这个词。大家重视国情，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作为现时代的人，应该充分了解自己国家的国情；现时代的政府，也需要干部和群众都了解国情。这犹如每个人必须认识自己的母亲，必须熟悉自己家里的日常事务一样。

什么是国情，国情就是指国家基本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它包括国土资源，人口和各方面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各种社会关系和现状，各种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民族精神文化的传统；以及各种巨大的潜力和客观存在着的种种限制。可见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丰富多采的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历史、地理、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思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法律、卫生、人口、气候、气象、地震、灾异、科学、技术、矿藏、特产、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水利、交通、外贸、语言、文字、阶级、政党、政府、政治斗争、宗教、行政区划、山川、土质、制度、礼仪、艺术、教养、爱好、民族性、社会生活……等各种材料。

在上述各个方面，每个国家往往都各有各的特点。譬如东方国家同西方国家相比，就可以看出有很大的差距；而同是东方国家，甚至近邻之间，也不会相同。社会制度不同的

国家，当然存在极大的差别，即使属于同一类社会制度，各个国家仍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国情不会相同。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就与欧洲古代的封建社会有许多不同之处；现有的资本主义各国，互相之间也有差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看来也难完全强求一律。因为各国都有各自的长处，也有各自的弱点；有各自的有利条件，也有各自的不利因素；有各自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还有各自的文化遗产与风俗习惯……所以不论是任何一种好的主义、好的制度、好的经验、好的办法，都必须因地制宜，从客观实际出发，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归根到底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状况。

列宁指出：“真理是具体的。”（《列宁全集》第1卷第507页）这也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可见任何工作都没有千篇一律的死模式。了解国情非常重要，只有摸透国家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才能心中有数。

因此，国家的建设首先要从自身的国情出发。落实到每个地方、每一项具体的建设任务，直至每一人的具体工作，都应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国情，从国家的实际情况着眼。所谓“量体裁衣，有的放矢。”别人的时装，自己不一定合适；外国的大菜，中国人不愿把它当作常餐。生活琐事尚且如此，国家大计如果不顾国情，任意移栽，后果不堪设想。这就需要提倡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科学态度。我们要摸的“石头”，首先就是摸清本国的国情，本地的方情和本行的行情。

西方国家有一个提供国情的好办法——不论国家大小都

有一部介绍本国各方面具体情况的“百科全书”。连一两百万人口的小国家，也有一部它自己的《百科全书》，好让自己的人民对自己的祖国一目了然。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光靠一部《大百科全书》还是不够用的（何况还没有编纂付印）。我国的大省如四川，有将近一亿人口，被称为“天府之国”；较小的省如浙江，人口也有三千多万，向被目为“文物之邦”，具有许多独特的地方特点。因此各省都需要有地方性的“百科全书”，便于提供必要的资料给本省的干部和群众参考。

我们民族向来有一种优良的传统，叫做修“方志”。方志，就是采用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区划的综合性地方百科全书。书的内容，是介绍本地方的全面情况。所以俗语说：“县太爷下马看方志。”新来乍到，第一项事情就是翻阅方志，了解当地民情和方情，也就是需要摸一下“石头”。

古来的成规是至少每六十年修一次方志，有的地方还设立经常性的修志机构——“志科”。例如，“浙江通志馆”就曾是全国著名的一个修志的专门机构，它经常地为修志积累可靠的资料。

方志，这一门边缘学科，实是我国文化悠久的一项特产，它长年累月地为各地积累各方面的资料，可以供给各门学科参考，特别是对社会科学各学科和地方行政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历来所修方志之多，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这个优良传统不应中断。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不要让后世子孙骂我们，这样悠久的好传统在我们手里中断了。

如今大部分省的省志和县志，都有六十年以上没有修了，有的停修已达一百多年，在抗日战争和文化革命中各种

资料大量散失，如不及时抢修，就将有中断的危险。

目前各省省委领导已开始重视这一工作。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一代所要编修的方志，应该是新的方志，即科学的方志，不能仅仅是旧志的继续。我们的继承，必须是批判的继承，也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整理前人的遗产，去全面调查研究本地区各方面的百科知识，用精确的数字，精确的图画，精确的测绘，精确的照片，精确的统计表格，精确的文献记载，精确的调查材料，……综合反映出本地区的面貌。

有的同志仅仅把方志当作历史掌故、乡土史料或地理专书，这样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须知志不同于史，史不能代替志。方志更不是地理专书，地理只占方志极小篇幅。方志的内容远远地超出史书或地理的范围，它不但有纵的历史沿革，更主要是有横的综合性的社会解剖。它不但有大事、要人的有关记载，更重要的是收集保存本地区各项有价值的细致可靠的材料。它决不是只供人们欣赏用的地方掌故，而应该也是比较完整的具有相当精确性的科学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富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所以，现时代的新方志，不能只在旧方志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或者依样画葫芦，原地踏步；停留于旧的水平是不可能适应新的要求的。

当然过去修志的一些经验、理论、方法和体例，至今还可以借鉴，特别是被誉为方志学开山祖的章学诚，所著《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等名篇，有一定价值，值得参考。但不能由于借鉴而以此束缚自己的思想。推陈必须出新。所谓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根据新的情况、新的条件、新的社会需要，去进行收集、整理、总结和